

自强——珞珈精神的源头

——纪念自强学堂首任总办蔡锡勇先生

蔡 凯 如

在我的曾祖父蔡锡勇辅佐张之洞创办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并任自强学堂首任总办一百周年之际,历史的巧合把我和先祖开创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正好在武大新闻系任教,我的女儿也正在武大外语系学习。祖传家教使我自幼就萌生了追寻先祖业绩的愿望。适逢当今盛世,青史可鉴,我以《辞海》、《中国名人大辞典》、《中国近代史辞典》等辞书^①和有关人物评传所载“蔡锡勇”条目为线索,参照蔡锡勇父子(曾祖父和他的次子、我的祖父蔡璋)遗著,张之洞文集以及当代语言文字学界、速记学界、会计学界、近代史学界对“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先驱蔡锡勇”^②和“创造中文速记、引进西方复式会计的先驱——蔡锡勇”^③等研究资料;关于武大校史沿革的考证;再有我的叔父蔡养源补正的龙溪蔡静远堂宗谱,等等。据此辨析考证,得以大致廓清蔡锡勇这位“器识闳深,人才罕见”^④的前清内阁学士以科学、教育和实业献身民族自强的历史功绩和奋斗精神。

蔡锡勇(1847—1898)字毅若,又字启运,福建龙溪人。出生于早年离乡游宦在外的京官家庭,师承晚清著名科学家李善兰(时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于同治四年(1865年)以各科名列前茅的优秀成绩毕业于京师同文馆^⑤,旋由大臣陈兰彬(荔秋)奏带出使美国、日本和秘鲁等国,充任清廷使馆译官、参赞等职务,凡十年之久。出使美、日等国期间,蔡公利用其担任文化参赞之便,广泛涉猎西方近代新兴科学,热衷于数学、化学、冶金研究和对外国文字改革、教育、经济的考察;曾因解答数学难题获哈佛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我叔父原存有曾祖父行状一本,并有他获博士学位后的摄影照片,可惜“文革”中毁于一旦,现已杳不可寻)。尔后清政府委为内阁学士。张之洞曾这样评价蔡锡勇:“博通泰西语言文字,深究天文、格致、测算等学,于各国外政畅悉利病源流”;“于格致、测算、机器、商务、条约、外洋各国情形政事,无不详究研询,属通达事务体用兼赅。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着实,实无有能出蔡锡勇之右者”^⑥。对张之洞保荐蔡锡勇的奏折,光绪皇帝曾硃批:“蔡锡勇著交吏部带领引见,钦此”^⑦。

早年求学于京师同文馆,继而出使西洋诸国的经历为蔡锡勇日后在张之洞幕下承担经济、教育和洋务实业重任打下了广博深厚的学术根基,也增长了运筹洋务诸业的见识和阅历。光绪元年(1875年)蔡锡勇回国后,由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送广东差委,来到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幕府任职,不久便参与创办工矿企业及近代学堂,深得张之洞赏识,“一切事务,悉以谘之”^⑧,莫不言听计从。当时有位新任驻日大使,要求咨调蔡锡勇去任参赞,张之洞立即上奏请求免调。蔡锡勇在张之洞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而张之洞之所以在两广总督任上迅疾从“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的清流党坚定地一变而为仿效西洋广兴实业的洋务派,并

由此开始全面建构和实施“中体西用”理论,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出使西洋诸国十年之久、“器识闳远,熟悉洋情”的蔡锡勇诸多新思想的影响和触动(张之洞一生不曾出国)。自然,蔡锡勇对这位才识卓著的顶头上司也是感恩戴德,极尽“为知己者死”之能事的。所以我们评价蔡锡勇在教育 and 洋务实业上的历史功绩时既不能脱离他作为张之洞的幕僚,诚甘听命和受制于张之洞,在政治上有其局限性的史实;同时也要看到他凭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推行西学的不懈努力影响和促成了张之洞由传统向近代转化。这样看来,蔡锡勇除了在学术上作为中国文字改革和引进西方复式会计的先驱之外,他在经济、教育、外交和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实绩,则不可抹煞地和张之洞创榛辟莽的功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张之洞对此亦有公正的评价。因此,我在粗略归纳蔡锡勇的主要历史功绩时,也是将张之洞对朝廷的历次奏折中有关蔡锡勇的专奏以及张之洞有关文稿和手谕作为重要依据,加以佐证的。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蔡锡勇一生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献身储才新业,以教育图自强

在追随张之洞 20 余年的宦海生涯中,兴办教育可谓是蔡锡勇呕心沥血、最为动心的事业了。继成功地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之后,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 年)随张之洞移督湖广,又开始了在湖北创立一系列新式学堂的壮举。由此至他去世前的 9 年间,直接参与创办了两湖书院、自强学堂、算学学堂、工艺学堂、武备学堂、矿业学堂、工业学堂、铁路学堂等前后共 10 所新式学堂。每所新式学堂的创立,从选址造屋到制订学堂章程、延请教习、详论学生课程事宜,无不浸透着蔡公的心血。张之洞曾在《为蔡锡勇请恤摺》里陈述道:“臣前于广东省创办银元局、水陆师学堂、鱼雷局;及到湖北后,创办炼铁厂、枪炮厂;银元、织布、纺纱、缫丝等局;自强学堂、武备学堂;虽资群策群力,而该故道实总其成。”由此可见,张之洞在兴办洋务实业和新式教育中对蔡锡勇的倚重。奏折中提到的自强学堂,即今武汉大学的前身,这所我国近代最早实行分科教学的高等专门学堂,从校名到办学宗旨都集中地体现了“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的教育思想,深谙其道的张府总文案、湖北补用道蔡锡勇虽已身兼数职,实务缠身,仍然义无反顾地担起了“自强学堂总办”的重任。

1896 年(光绪二十二年)6 月 27 日,张之洞特地给自强学堂总办蔡锡勇致札,要求改定自强学堂章程。自强学堂的分科教学自此日臻完善,专门开设了英、法、俄、德、日五门外国语言学,同时还附设译西书的机构。课程设置除各科主修课外,学生还可自愿兼习化学、地学、分析试验、经学、历史、算学、交涉、商学、法学、体操、兵操、劳动实习等课。学堂总办蔡锡勇还曾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他发明的汉语拼音文字——“传音快字”。据自强学堂学生、台湾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汪怡在 50 年代初回忆:“当我十八岁那年,蔡氏以湖北自强学堂督办(校长)关系,把他所著的传音快字分送给在堂学生……我的直接研究速记,也便从得到他那书起。”^⑥

蔡公对新式教育始终满怀热忱。1891 年(光绪十七年),他在武昌三佛阁主持铁政局时,对算学学堂就曾特别关照,表示只要学生愿意兼习化学、矿学,便可以就近到铁政局见习。怀着这样的拳拳之心,蔡公生前署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于公务异常繁忙之中,仍视学务为百务之中头等要事,丝毫不曾稍息。时值汉阳铁厂、兵工厂、大冶铁厂、银元、织布、缫丝等局厂困难重重,各类新式学堂陆续开办,千头万绪,事必躬亲,锡勇公甚至无暇到江汉关正式赴任。然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十一月的一天,蔡公从大冶视察归来,在汉口一交待完公事,便以学堂监督的身份匆匆渡江赶往武昌,去参加武备学堂的开学典礼。不料江中陡起狂风,摧折桅杆,木制官

船已将倾覆,幸赖救生红船抢救,始得转危为安。此中情景,《张文襄公全集》和我家宗谱都有详细记载。蔡公以劳累不堪之躯遭此突变,“猝得类中风之症。调治虽愈,元气未复,交卸道篆后,仍力疾总理各厂事务,夙夜在公。督催枪炮厂工作,较定武备学堂章程,不遗余力。卒以百务丛集,劳瘁过甚,旧疾复发,猝不及治,顷刻身故。其疾作之前数刻,犹复手书致武备学堂洋务教习详论学生课程,事理周密,即于是日夜间病故,身后萧然,债负累累,僚属同人,同声悼叹”^①。我家宗谱是这样记载蔡公最后时刻的:“至半夜,总督衙门派人来敲门请办急件,祖父披衣下床,握笔久不动,左右亟扶持,盖已因脑溢血不治去世。享年五十一岁。”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蔡公的逝世,令张之洞痛惜不已:“微臣失此臂助,极目时艰,人才罕见,犹不能不为国家惜此人矣”^②!

锡勇公故如张公所言,“卒以百务丛集,劳瘁过甚”,而他为培养经国人才殚精竭虑,奋斗不止的自强精神,则尤为令人感奋。想当今武汉大学,定将肩负先辈学者和民族民众的厚望,以“自强”为体为魄,重振雄风,以煌煌教育业绩和科研成果,高踞于世界的东方!

二、力行“西用”洋务,以实业图自强

蔡锡勇在洋务实业上的建树,当以1865年(同治四年)18岁开始,“历充美、日、秘各国翻译、参赞等官……熟悉洋情”为序幕;以1875年(光绪元年)28岁来到张之洞幕下参与办银元局、鱼雷局为发端,“继在广东、湖北办理洋务交涉事宜,先后二十余年”^③。

从张之洞在历次上奏折中对蔡锡勇的极力挽留、诚心保荐和为之请恤中可以看出,蔡锡勇在张之洞的洋务事业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作用,也观照出张之洞与蔡锡勇在创办洋务实业、实现自强要举中形成的共识与默契。

在《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张之洞上奏请求免调蔡锡勇出使日本,首次表露出他对蔡锡勇的赏识:“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局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机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5年后,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将蔡锡勇奏调湖北任用,在《调蔡锡勇等赴鄂差委片》中称:“蔡锡勇器识阔远,熟悉洋情……办理粤省洋务有年。近来粤防、交涉、创造,一切事务,悉以谙之。该员力持大体,动中机宜,深资倚任。”在移督湖北第二年的光绪十六年(1890年)五月,张之洞决意创办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同时将铁政局总办这一要职委派给“器端识远,心细才长,熟悉洋情”的湖北补用道蔡锡勇,让他主持创办钢铁联合企业的一应工作。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月,汉阳炼铁厂正式破土,两年后所属各厂陆续告竣。汉阳炼铁厂的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7年,其规模在当时的亚洲首屈一指。可惜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上其它各方面的原因,汉阳炼铁厂开工不到半年便因煤炭不足被迫停炉。在此情况下,张之洞只好致电蔡锡勇,商量要否将铁厂“包与洋人”。蔡锡勇权衡再三,最后通过湖北纺纱局总办斡旋,使汉阳炼铁厂于光绪二十三年改制为由盛宣怀主持的官督商办企业,从而保住了这一民族近代工业的根基。

继汉阳炼铁厂动工后,湖北枪炮厂也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动工,两年后落成,亦由蔡锡勇主持。蔡锡勇去世后,张之洞奏请光绪皇帝将其长子蔡琦(我的叔祖父)署五品衔督办汉阳兵工厂(即湖北枪炮厂),该厂大门上的“汉阳兵工厂”五个大字是蔡琦夫人——崔太夫人手笔,气势雄浑非凡,至今清晰可辨。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步枪“汉阳造”,直到本世纪中期,依然是中国的主要步兵武器。

通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张之洞终于得以在湖北建立起包括冶金、矿业、军工、纺织等行业、门类相当齐全的近代大工业体系,尽管经营管理诸方面差强人意,但它毕竟打破了传统的小生产方式的一统天下,奠定了民族近代工业的根基。而湖北这样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也因之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⑨。

张之洞在湖北成就的这一番事业,无疑包含着蔡锡勇的杰出贡献。对此,张之洞曾在《保荐蔡锡勇片》中慨然称颂:“再臣创设炼铁、枪炮、织布三厂,先后竣工,虽资群策群力,而总司三厂之成者,实唯湖北试用道蔡锡勇一人……到鄂以来,派委总办铁政局……督饬矿师洋匠建厂安机……自经始以至工竣开炼,千端凡绪,布置井井,罔有遗漏。臣以督工筹款,艰巨烦难,叠经奏明……先后加委该员总办织布、枪炮两局,任事诚恳,殚竭心力,条分缕析,事事力求撙节核实,不避劳怨,而端谨廉退,丝毫不苟,和平默讷,不与人争。三厂分局二十余所,委员学生林立,群莫敢以私;各矿师洋匠,亦服其公正,无不尽心协力,办理悉臻周妥……”。

在创办洋务实业中,蔡公之所以每遇繁难,“悉臻周妥”,除了他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通晓采矿、冶金、纺织、机械等近代工业技术,且熟悉洋情,和洋员应对自如,便于疏通感情,达成谅解外,还因为他一贯廉洁清正、作风严谨,在中外同仁、商贾、工匠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在《为蔡锡勇请恤折》中,张之洞赞叹道:“该故道志操廉正,……天怀淡泊,任事吨诚。凡各国领事、江海税司以及矿师洋匠,中西商贾,莫不钦其耿介,服其明达。遇交涉重要繁难之事,他人棘手莫办者,该故道靡不迎刃而解。所办铁、布、枪炮各局厂,经手款项多至数百万两,力杜虚靡,丝毫不苟。适其歿也,囊无余蓄,旅殡难归。各国洋报流传,咸加惋惜伤悼,异口同声。”

我家宗谱也记载了蔡公生前清贫境况:“祖父一生清苦,不尚虚靡,惟自幼好学,家中藏书极多。”又道:“祖父清廉自守,家累綦重,猝然去世,竟因贫无以为殓。张之洞公亲来吊唁,见身后萧条情形,当即致送纹眼二百两,勉成大事。”宗谱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当蔡公主持汉阳炼铁厂和兵工厂时,国外已有“佣金”之例。洋商按例给他致送佣金(此处“佣金”似相当于时下的“回扣”——笔者注),被蔡公严词拒绝。对方无法处置此项佣金,乃购火轮船一艘相赠。蔡公将火轮船拨归善后局使用(此事《清廷掌故零拾》一书亦有记载),自己仍乘那艘木制官船,帆棹过江。以致生前那次渡江参加武备学堂开学典礼时,因木船抵挡不住狂风巨浪,险遭不测,而终至埋下中风病根,不久便被夺去了生命。

总而言之,蔡锡勇在张之洞麾下力行洋务实业 20 余年,荦路蓝缕,惨淡经营,以“臂助”之功,在湖北蔚成自强大业,功不可殁。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他们所做的一切,不难看出,张之洞、蔡锡勇所开创的洋务实业对于中华民族的自强,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客观上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

三、创造传音快字,引进复式会计,以科学图自强

蔡锡勇的科学救国思想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的延伸。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曾经在上称雄一时,为什么近代如此落伍?他认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当今中国文字,最为美备,亦最繁难。仓史以降,孳乳日多,字典所收,四万余字,士人读书,毕生不能尽识”^⑩。繁多难学的汉字,客观上造成了民众文化素质低下,使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难以普及。因此,要实行科学救国,必先实行教育救国;要实行教育救国,必先实行文字改革,让老百姓快而易地学会认字、写字。这一认识虽然没有达到——就蔡锡勇自身所处时代和地位也不可能达到——要救国就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度,但它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普及教育和科学文化知识富国

强民,向近代化迈进。因而就其本身来说,于社会进步是有益的。

在出使美国华盛顿任使馆文化参赞4年期间,蔡锡勇潜心考察西方科学文化,发现人们在“议政事”、“判词讼”时用一种“快字”记录,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一分钟能作二百余字”,深感这种快字“一人可兼数人之力,一日可并数日之功”^⑨。由是,他参考美国凌氏速记学(Lindsley Tachygraphy),创造出一种以认读为主,声、韵相拼,分平仄四声的中国式拼音文字,定名为:“传音快字”,用以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蔡锡勇撰述的我国第一部速记型汉语拼音文字专著《传音快字》在武昌正式出版发行。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于1956年9月重新出版了蔡锡勇的《传音快字》,并作了说明:“这是1896年出版的拼音文字方案和著作,这个方案采用速记符号为拼音的字母,是中国拼音文字方案中‘速记派’的元祖,后来(由其子蔡璋——笔者注)发展为中国最早的速记学,这个方案的特点是开始以北京的官话作为拼写标准。”

蔡公十分重视传音快字的推广运用,在家族里传授快字,将快字作为家族间通信的工具。我祖父、父亲及其兄弟姐妹以及祖上衙门差役书信往来都是采用传音快字。蔡公在《传音快字》自序中说:“以授儿辈,数日悉能通晓,即以此法传信往来。幼子八龄,亦能以言自达”。后来他又以此传授给亲友和府中仆役,并在自强学堂当堂向学生传授和赠书,亦“不过旬月之功”。

其后,蔡公次子蔡璋(1872—1958)(我的祖父)在“传音快字”的基础上采用连书法,加快书写速度,于1912年(民国元年)发表了我国第一部以速记命名的专著:《中国速记学》。1913年,蔡璋以“发明速记学,于学问、实业均有功绩”,获民国政府大总统四等嘉禾章。1922年又获黎元洪亲笔签名的民国政府大总统二等嘉禾章。

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当时民国政府大总统冯国璋题褒《有功艺林》匾额追授给蔡锡勇,同时颁发的褒状高度评价了蔡锡勇首创汉语拼音文字,造福国家民族的历史功绩:“大总统褒曰:设经义治事之斋育才,念切创会意谐声之字考古。功高自昔文人,类多宗匠。征诸载籍,弥觉难能尔。福建已故蔡锡勇,禀资颖异,识见过人,图经探山海之奇,文字辨砮卢之体,操之有素,知非强记不为功。归而著书,公诸同好以利用。……结绳而治,上古无此文明;以简御繁,大篆益形烦冗。书之青史,光乃黄垆。”

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蔡锡勇不仅首创汉语拼音文字,发明汉语速记,为中国文字改革作出了奠基式的贡献,而且第一个引进西方复式会计学。他和其子蔡璋在推进我国近代会计科学发展上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

在广东和湖北从事洋务实业期间,蔡锡勇接触到大量财金管理方面的具体业务,深感在中国流传了一千多年的传统记帐法(簿记)——四柱帐法远远适应不了近代工矿企业管理的需要,极需改进。于是,他根据出使美国期间学习、掌握的借贷簿记法,写成《连环帐谱》书稿。书中的“连环”二字,即对应、复式之意。后来蔡璋到日本考察,发现日本已在推行西方的复式会计,回国后立即将蔡锡勇的《连环帐谱》加以修订,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出版发行。该书早于谢霖著、孟森作序的《银行符记学》两年,而成为中国开始推行西方复式会计的嚆矢。此时蔡公已作古多年,他和其子蔡璋以及谢霖、孟森被人称为“计坛四先驱”^⑩。

对蔡锡勇父子在中国首开复式会计先河的史实,方兴先生在他的《借贷复式记帐法引进我国考》一文中有记载^⑪。另一位会计学者郭道扬先生则在他的《中国会计史稿》一书中明确指出:“借贷复式帐法正式传入我国始于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由我国学者蔡锡勇所写《连环帐谱》一书出版发行作为开端”,并称该书“对推动我国近代会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中国财经出版社即将重印出版《连环帐谱》一书。在市场经济日益走向健全的今天,

复式会计将以更快的速度不可动摇地取代旧式四柱帐法,《连环帐谱》也将因此获得新的生命。

当我们探究蔡锡勇的科学道路时,可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会计学科和文字、速记学科似乎并无相通之处,这两门不同类别、不相关联的学科,何以“中西结合系出同门”呢?这自然与蔡锡勇广博的学科知识、深厚的学术根底有关。有人曾在研究清末著名科学家、京师同文馆数学总数习李善兰时提到,李善兰“任职十余年授徒百余人,知名的胡玉麟、席淦、熊方柏、蔡锡勇等。诸生以学有成效或官外省或使重洋,在传播近代科学知识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①”。可见,蔡锡勇早年在北京同文馆就学时就是一位有名气的高材生,打下了近代科学知识基础。再如前所述,10年出洋期间,蔡锡勇广泛涉猎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新兴科学技术,博采“西学”所长,使他得以游刃有余地根据国情、民情,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

语言文字学者葛继圣先生认为,蔡锡勇父子在创制汉语拼音、中文速记的同时,又成为西方复式会计引进中国的先驱,这与蔡锡勇后半生长期从事兴办近代工矿企业的需要有关。蔡璋在未调进资政院从事速记事业以前,也承继父业办洋务实业。他们亲眼看到,在近代化大型工业、企业里,沿用旧式四柱帐法,根本无法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因而他们决心把西方复式会计介绍和运用到中国来。

遗憾的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旧社会,人们对改革文字、推行速记以普及文化教育,提高民族文化素质缺乏自觉和热情;对应用西方复式会计以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缺乏认识 and 信心。因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蔡锡勇父子在文字改革、速记和会计学科领域里如此重大的开创业绩湮而不彰,以至1909年(宣统元年)7月还发生过清政府聘请日本人雄崎健担任议会速记职务的憾事(后消息传出,经蔡锡勇在译学馆学习的幼子蔡玮推荐,蔡璋才得以率学生进入清政府资政院任议会记录)。

汉语拼音、中文速记和复式会计的创始、引进至今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它们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作为培育这一科学的先辈学者蔡锡勇父子因此将得到人们永久的纪念。

注 释:

① 以上辞书对蔡锡勇基本情况的叙述有出入,本文已作修正。

② 见黎宏基:《汉语速记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⑤⑨ 转引自葛继圣著《蔡锡勇史料新探》。

④⑥⑦⑧⑩⑪⑫ 引自《张文襄公全集》。

⑬ 转引自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第5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⑭⑮ 蔡锡勇:《传音快字》,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版。原书初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6年),版权页印有“发行所,武昌大都司巷口蔡公馆”字样。

⑯ 转引自《文史知识》1991年第2期。

⑰ 转引自《上海会计》1982年第8期。

⑱ 见《人物》1987年第6期:《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李善兰》。

(本文责任编辑 车 英)